

J 25828

校附

則法本基的展發濟經義主會社論

著夫諾加維洛特斯奧

譯業世董 光曙劉

學大民人國中

日二十月九年一五九一

論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法則

偉大的衛國戰爭非常明顯地顯示出蘇維埃國家制度的牢不可破的鞏固性，顯示出其經濟基礎的強力及活力。斯大林同志在其紀念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七週年的報告中曾指出，『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基礎，比較一切敵對國家的經濟，有着充沛無比的活力。由十月革命所產生的社會主義制度，賦給了我國人民和我國軍隊以不可抵抗的偉大力量』。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爲我國的生產力開闢了極爲廣闊的發展餘地。爲着更進一步理解蘇維埃經濟的力量與強韌性，必須着重說明其內在的發展法則。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法則，決定於蘇維埃制度的本質，而蘇維埃制度則是以生產手段的社會所有制爲基礎的。

生產手段社會所有制的勝利使蘇聯的經濟與階級構成起了根本的變化。這個勝利消滅了剝削階級，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這就是說明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極關重要的要素。伴隨着社

會所有制（國有及合作社集體農莊所有）的勝利，在我國就產生了史無前例的、新的階級構成：社會主義社會是由兩個主要的、非敵對的友愛階級——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構成的，此外還有蘇維埃的知識份子。

凡此種種，都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的性質本身。因此在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諸法則時，就應該以生產手段之社會所有制為研究的起點。不然就無法了解這些法則的內容，也無從理解這些法則所表現的形式。

不論那一種社會制度，其經濟發展的諸法則，都是導源於各該社會所具有的生產關係體系的。

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不論在內容方面以及在其所表現的形式方面，都在原則上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法則。

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法則是建立在生產手段私有制的基礎之上的，它所表現的乃是人對人的剝削關係，乃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各種敵對的矛盾現象。而社會主義社會現存的階級——工人階級與集體農民——之間的關係，却不帶有敵對性，它是一種友愛的階級關係。與此相應，在社會主義經濟諸法則中所表現的關係乃是友好合作與社會主義互助。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與剝削者所統治的社會構成迥然不同，它並不是以敵對的矛盾現象為基礎而發展的。

資本主義經濟諸法則所表現的是統治人們的盲目力量，是盲目的必然歸趨。社會主義的經

濟法則和資本主義法則根本不同，它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盲目的必然歸趨。黨和蘇維埃國家是自覺的努力於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這就是蘇維埃經濟制度異常優越的地方，這就使我們既能向前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能使之免於發生不良現象，而這些不良現象則是盲目發展的經濟法則所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經濟法則的盲目性最鮮明的表現，就是生產過剩的週期性危機，這種危機總是伴着生產力的慘重破壞而降臨的。

『這上面的區別，——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寫道，——正如雷雨時所發電光的破壞力與電報上弧光燈上所馴順地運行的電力二者中間的區別一樣，也正如火災時的火與供人應用的火二者中間的區別一樣。』

因此，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所獨具的特點，就在於它所表現出來的作用並不是支配着人類的盲目法則，而是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有意加以利用和採用的法則。然而這並不等於說這些法則已喪失了客觀必然性的力量，並不等於說我們可以任意去製造這些經濟法則。但不久以前，在若干經濟學家中間，却相當流行過這種不正確的見解。他們認為：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似乎不必顧及決定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切條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創造經濟發展法則，而不必考慮各種經濟要素和各種物質前提。

這乃是對於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性所採取的一種主觀主義的、唯心論的態度，從本質上說，這種態度是一種『理論上的詭辯』，這是想從理論上替左傾偏見作辯護，替那些打算跳過應有的階段來發展蘇維埃經濟的企圖作辯護，替那些打算人為地強行集體化與人為地硬設立共產公社的企圖作辯護，替那些——借斯大林同志的話來說——『左傾』白痴份子硬要廢止商業和貨幣等等的企圖作辯護。

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發展，無疑使經濟理論的意義變為烏有。否定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事實上就等於不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凡是失掉必要連貫性的地方，那裏就不復存在科學。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強調指出說：所謂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人類的自由，決不是說人類可以離開客觀的法則，而只是說可以認識並利用這些法則；馬克思又說，只有在必然性的基礎上，自由才能開花。斯大林同志在其名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寫道：『……無產階級底黨要想成為真正的黨，首先就應該精通生產發展的規律，精通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這和上述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符合完全一致的。

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諸法則的客觀必然性，決不等於消極地服從於這一必然性。列寧，斯大

林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理解，和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復辟者——布哈林份子與托洛茨基份子之流——的見解是不可調和的。這羣東西企圖按照資本主義那些給人類以盲目影響與支配的經濟法則，來說明蘇維埃的經濟法則。

黨和蘇維埃國家所以要認識蘇維埃經濟法則，是爲了要把經濟發展法則利用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去，是爲了要積極干預新與舊的鬥爭過程，是爲了粉碎社會主義的敵對力量和盲目的傾向，並把經濟發展引向新的途徑。

爲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諸法則，對政治與經濟問題予以正確理解，同樣並對蘇維埃國家的經濟作用及其巨大的組織力量和改造力量予以正確理解，這是特別重要的。

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方面根據經濟的決定性作用出發，認爲經濟是政治的基礎，而政治則是上層建築物；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極力強調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恩格斯說：政治能够從三方面給經濟以影響：（1）它能够促進經濟發展，（2）它能够阻礙其發展，（3）在某幾點上推動它發展，而在另外幾點上，又阻礙它發展。

恩格斯寫信給約瑟夫·布勞赫談到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們時，說他們常常『賦給經濟方面以不應有的過大的意義』。恩格斯的這一原則，可以完全適用於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修正派馬

克思主義者們和第二國際的觀念論者們卑鄙地歪曲馬、恩關於經濟比政治及其他上層建築物佔首要地位的學說，而故意壓低以至輕蔑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把這些政治制度與政治思想降低為經濟的消極附屬物。

從這裏就產生了考茨基等人的所謂生產力的理論，從這個理論中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是生產力發展的消極產物。考茨基和一般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就以這種『理論』為根據而歸納出結論，說只有那些擁有極高度的生產力水平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說俄國還未成長到社會主義的階段。

列寧和斯大林的偉大功勳，首先就在於他們粉碎了修正派們歪曲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政治、經濟的相互關係的學說之企圖。

列寧在其針對孟什維克份子蘇哈諾夫所作的論我們的革命一文中，曾尖銳地批評了孟什維克這種顛倒是非的生產力的理論。『如果說創建社會主義——列寧寫道——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應該是怎樣的水平），那末我們為什麼不可以一開始就先用革命手段奪取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再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進而追上其他國家呢？』●

列寧會極力強調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是消滅我國經濟落後性的最重要前提。由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說，政治雖然是由於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但當其具有必要的物質前提時，就會成為徹底改造經濟的一個決定性的要素，因而也就會成為推動經濟急劇發展的一個決定性要素。列寧的預言已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中，得到輝煌的證實。

由此可見，列寧正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相反，他堅持地強調了政治對經濟的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終也沒有忘掉，歸根到底經濟還是決定政治制度的基礎。

列寧在針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作的再論職工會……一文中曾給政治下了定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列寧的這一原則，在俄國共產黨（布）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職工會的決議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決議中寫道：『政治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而且是經濟的總括和它的完成』。這裏清楚地說明了政治和經濟的相互作用，即：如果說政治決定於經濟，而且是經濟的最集中的表現，是經濟的總括和完成，那末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政治對於經濟是起着積極作用的，因為只有從政治中才可以找到經濟發展的集中表現和總括。

政治不僅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和總括，而且也是經濟的完成，——這一原理原則的深邃意義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該著作中說：

「社會思想、理論和政治制度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社會存在發展過程中業經成熟的
那些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物質生活，造成必要條件
來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業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物質生活可能向前發展」①。

由此可見，雖然政治這種上層建築物是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但是要使經濟發展的新趨勢獲得應有的成就，那就一定少不了政治制度的積極作用。能够反映並綜合經濟發展中新需要的合理政治，也就是一種能够改造經濟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會「澈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中業經成熟的任務」（斯大林）。

黨和蘇維埃國家所執掌的政治對於經濟的影響是大大增長着，而且具有新的性質；這是因為蘇維埃國家不僅體現着政治威力和經濟威力，而且也是主要生產手段的所有者。

這就是說：

（1）蘇維埃經濟諸法則所表現的作用，乃是對之已有認識的法則，乃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自覺地加以利用和使用的法則；

（2）蘇維埃國家的政治集中地表現着經濟發展的最前進最進步的趨勢；

（3）蘇維埃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不同。在蘇維埃國家，政治所表現的是工人階級、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一版，中譯本，第七四九頁。

集體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利益，是我們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在資產階級國家，政治所表現的則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和勞動大眾的利益有着深刻的矛盾。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在蘇維埃社會條件下，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

斯大林同志在他論黨的工作的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份子及其他兩面派的對策的演說中說道：『……在實際工作上，政治和經濟是分不開的。它們兩者是同時並存相輔爲用。因此，誰如果想在我們的實際政策中把政治和經濟分開，以減弱政治工作爲代價來加強經濟工作，或反之，以減弱經濟工作爲代價來加強政治工作，——那他就一定要碰壁』。

黨和蘇維埃國家有可能把國內一切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集中成爲一個統一的力量，以達成既定的目的。這在其他任何社會制度之下都是做不到的。蘇維埃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不同於資本主義者即在於此。

資產階級國家的職能，歸納起來主要的就是組織國防、維護『秩序』、徵收賦稅等。『至於經濟，——斯大林同志說道，——本來是很少和資本主義國家有關聯的，經濟並不受國家操縱，恰恰相反，國家反倒掌握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手中』。

上述情形，和國家資本主義傾向趨於強化（特別是在戰時條件下）、資產階級國家加強干

涉經濟生活這些事實，並不發生絲毫矛盾。資本主義經濟的戰時調整並傷不到資產階級經濟的基石——生產手段私有制。這種干涉，——斯大林同志在他和英國作家威爾士的談話中稱，至多不過是「對一些任意胡爲的資本家利益的代表者們稍加抑制而已，不過是把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這一方式加強一下罷了」。

和資產階級的國家相反，蘇維埃國家自身便是一個有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力量，它已認識到的法則爲基礎，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行有計劃的領導。

*

*

*

在列寧與斯大林的著作中，曾經規定了社會主義生產方法的基本發展法則。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經濟。這在馬克思的時候，就早已把這個法則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對勞動加以有計劃的分配，稱爲社會主義之下的第一個經濟法則了。

列寧曾再三強調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巨大意義，他就是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個遠大計劃（全俄電化計劃）的創始人與鼓舞者。從此在人類生活史上便展開了新的一頁。有史以來第一次由蘇維埃國家把經濟發展的槓桿掌握到自己的手中，而且這個由列寧——斯大林的黨所領導的蘇維埃國家已經顯示了自己的能力，它是能够按照預定計劃來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深刻地論證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下進行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並分析了計劃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是連續三次五年計劃的領導者與鼓舞者，這三次五年計劃，徹底改變了我國面貌，使這個技術經濟落後的國家一躍而為工業化與集體化的強國。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國民經濟計劃工作的可能性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實行生產手段與生產工具的社會所有制。

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計劃地組織各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因為這些企業乃是各個資本家或各資本家集團的私產；支配着資本主義國家的是無政府狀態，是企業與企業的互相傾軋與互相競爭；在那裏，盲目的經濟法則統治着人們的意志。

只有在社會主義勝利以後，才可能進行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不僅可能，——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而且絕對必要，因為社會主義經濟以其本質而論是不可能盲目發展下去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使計劃工作成為客觀的經濟需要，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法則。對於這一觀點，斯大林同志曾在其論農村中的工作的報告中，以集體農莊的生產為例，給以輝煌的論證。他說：

『集體農莊是巨大經濟，而巨大經濟沒有計劃是不能經營的。包含有幾百個農戶，有時甚至包含有幾千個農戶的巨大農莊，是一定要按計劃指導才可經營的。它沒有計劃』

指導，就要破產，就會瓦解。」①

爲什麼以社會所有制爲基礎的巨大社會主義生產一定要有計劃指導而不對盲目性稍加容忍呢？

這就是因爲：由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消滅和社會公有制的確立，那些盲目的法則也隨之停止了它的作用，而那些盲目法則曾經是支配着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勞動與生產手段之分配的。在我國，所有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競爭法則、瘋狂追逐利潤的現象、平均利潤率的法則以及生產價格法則，全被廢止了。代替這些的是計劃性的指導原則。

既然摧毀了資本主義經濟法則並有計劃地領導了各部門之間對勞動力與生產手段之分配，因而我們便能够以史無前例的飛快速度實現了我國工業化的龐大計劃，並實現了對我國農業施以社會主義改造和技術再武裝的計劃。

斯大林同志曾給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規定了總的和基本的任務，這些都是黨和蘇維埃國家在實施全俄電化計劃和歷次斯大林五年計劃時提示出來加以實現的任務。

這些任務就是：（1）在資本主義的包圍勢力中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獨立自主；（2）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全面統治，杜絕資本主義發生的源泉；（3）使之不再發生不均衡的現

象，而且要創造生產手段與勞動力的後備力量以便消滅可能發生的生產中斷現象。

國民經濟的計劃工作在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體系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切基本法則，也恰恰是在對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的指導過程中才能得到應用。編製國民經濟計劃的基礎，一方面是對過去的總結加以理論綜合，另一方面是對將來的發展遠景和發展趨勢能有所預料。

有計劃地領導國民經濟——這首先就是說要有預見，而科學預見的可能性則以對經濟發展的法則、傾向和需要加以深刻研究為基礎。但是，假如由此做出結論，說問題的關鍵僅在於如何預見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我們的國民經濟計劃，並不單純是經濟發展的預測，而且是領導經濟發展的實際力量；這些計劃就是為着要組織並動員羣衆去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各種任務。

在對蘇聯國民經濟實行計劃領導的過程中，已極鮮明地呈現出社會主義一切經濟法則的特質，這些法則乃是黨和蘇維埃國家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所認識到的、自覺加以利用和採用的法則。

對社會主義的各種經濟法則以及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已成熟的新需要，隨時加以體察與規定的是我黨中樞——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及其領袖斯大林同志：這些被體察出來經過規定的法則與需要，則在黨和政府所頒佈的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各種命令中表現出來。

蘇維埃國家的一切機關經常把這些命令中的指示體現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計劃中。

黨向羣衆詳爲解釋國民經濟計劃中的各種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及其實現的途徑，並動員羣衆積極爲完成與超過完成既定計劃而奮鬥。

和蘇維埃國家一方面組織這一鬥爭，一方面喚醒並獎勵羣衆發揮創造性與主動性，獎勵他們探尋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我們走向社會發展更高階段去的途徑。

斯大林同志在對一九三一年六月經濟工作人員會議所做的報告中說過：「如果以爲生產計劃就是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底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的實在性，就是活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

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給生產力之發展創造了從未有過的、新的因素和推動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資本家的追逐利潤，而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社會主義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便是創造高於資本主義水平的勞動生產率，便是保證生產力的增長達到如下程度，即能够供給我們豐足的產品，使我們能够過渡到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程度。但是在社會主義階段，要獲得更高度的勞動生產率，就只有利用人們的物質慾望來加以刺激，而使物質慾望得以實現的方法便是按勞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

在生產力的發展已到達目前這個水平的情况下，設法更加充分地滿足勞動者的需要，這已成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的主要任務之一了。

所謂蘇維埃經濟制度，就是『生產力的發展不為競爭原則和保證資本家鉤逐利潤的原則所支配，而為計劃指導原則和逐步提高勞動者的物質文化水平的原則所支配』（斯大林語）。

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在歷史中首次給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合理結合創造了一切必要條件。『社會主義——斯大林同志在和威爾士談話時說——並不是否定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不可能脫離開個人利益。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可能更充分地滿足個人利益。不僅如此，唯有社會主義才是個人利益的唯一的牢固保證。』

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是在反對平均主義傾向的鬥爭中確定的。這些平均主義的傾向所反映的正是潛在於經濟中與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實現按勞分配的原則有幾種不同的形式，譬如：對工人有計件工資制，對技術工程人員有獎金制，對集體農莊莊員有勞動日報酬制和追加報酬制。所有這些具體形式都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內發展工業與農業的槓桿。

在社會主義階段內，發展生產力的最重要因素乃是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更高的形式——斯達哈諾夫運動。

社會主義競賽的理論還是列寧所提出來的，這種理論在斯大林同志的若干著作中已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在這些著作中指出了社會主義的競賽和資本主義競爭有着深刻的、原則上的區別。競爭的基礎是弱肉強食，是殺人致富，是大魚吃小魚。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則是勞動者的友愛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原則。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斯達哈諾夫工作者會議席上，曾對斯達哈諾夫運動給以極動人的分析，他認為斯達哈諾夫運動乃是社會主義競賽的更高階段，乃是提高社會主義生產的極重要的新因素，他說：『成為斯達哈諾夫運動基本原因的，首先就是工人物質狀況底根本改善……只有我國革命才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的枷鎖，不僅給予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予了人民享受富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國革命力量雄厚而不可戰勝的原因就在於此。』

由此可見，在按勞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所表現出來的物質慾望乃是產生社會主義競賽，及其更高形式——斯達哈諾夫運動的基本原因之一。

注定了斯達哈諾夫必然產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社會勞動的性質已隨着向社會主義